

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社会学信息

何建章 陈一筠

我们根据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社科院的学术交流计划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下面简要汇报一下这次访问所得的主要社会学信息。

一、澳大利亚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社会学在澳大利亚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从1958年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社会学教师席位至今，还不到三十年的历史。目前，全国的十九所综合性大学之中，有十一所开设了社会学系，共有十六个社会学教授席位，在职的教学、科研人员大约有二百多人。

社会学系几乎都设在战后新建的大学。几所有上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如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艾德里大学，至今没有社会学系。多数社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学诞生如此之晚并且发展不快，原因在于受英国传统的保守势力影响。我们知道，英国人类学历史悠久。到达澳洲的英国殖民者，十分重视对当地土著民族的研究，所以人类学在澳大利亚的社会科学中占有优势。而且，澳大利亚过去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几乎都是从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古老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把母校的保守传统带到澳大利亚，对带有革新倾向的科学及各种不合常规的事物，均持反对态度。牛津、剑桥两所大学至今无社会学系，所以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传统的老名牌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的阻力颇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以外的欧美各国移民大量涌进澳洲大陆，使人口中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英国文化的一统天下渐渐被打破了。人口的增多，加速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里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进程比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快得多。移民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增加。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化向“大不列颠”传统发出了挑战。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1958年，新南威尔士大学（当时名为新南威尔士技术大学）设立了第一个社会学教席，在人文科学系的教学大纲中把社会学列为选修课，由莫温·布朗（Morven Brown）博士讲授。1960年，该校文学院正式把社会学当作一门专业课讲授，并增加了两个教师席位。当时，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课题主要是以教师本身的兴趣为转移。布朗感兴趣的是家庭问题和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这在今天仍是澳大利亚社会学的传统题目。后来陆续在其他几所新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分别开设了社会学导论、经典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社会政策以及医学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课程。1965年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自编的教科书，题为《澳大利亚社会》，作者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索尔·恩索（Sol Encel），这本书已三次再版。

现在，大多数综合大学有了社会学系，并且几乎在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在澳大利亚的普及率是很高的。悉尼大学分散在各系的社会学者正在致力于组建社会学

系,其他大学的社会学者也越来越活跃。1970年就建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社会学协会,是两国社会学者进行学术联系与交往的组织。从学会的会刊和其他出版物中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社会学者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广,已涉及到大众传播、生态环境、闲暇生活、女权主义、文化艺术等一些新的领域;研究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犯罪与越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计划与福利政策、人口与民族、性与婚姻家庭、社会心理学、社会控制与法律问题比较普遍。在澳大利亚社会学界,左派思潮比较明显,即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很大影响。这也许是比较保守的老大学不欢迎建立社会学系的原因之一。据说在英国,保守派曾认为,在新兴的那些“红砖”大学建立的社会学系,聚集了一批“造反”的力量,社会学讲坛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使一些人感到担忧。

从我们所到的大学来看,新南威尔士大学、拉特鲁布大学和堪培拉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力量,课程设置也较完备,均有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这几个大学的社会学家与政府建立的有关研究中心联系密切,他们经常合作承担联邦和州政府委托的一些特别研究项目,经费有所保证,研究成果能较多地对决策者起咨询参考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应用研究,这是澳大利亚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特点。近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在研究家庭、社会福利、移民问题、劳工与就业、贫困与社会平等诸方面的成果,颇受各级政府重视。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上,社会学者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有效的合作。好几所大学都有亚洲及太平洋学院,学者们重视区域性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澳洲发展援助局和政府的其他机构,都对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给予很大支持。

二、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象所有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社会科学家一般是在大学任职,担负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社会科学院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经费分配,组织与协调学术交流活动。该院只有很少几名工作人员,下面没有具体的部门和研究所。但澳大利亚有几个专门研究机构是颇具特色的。除了国立家庭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直接受联邦政府领导外,另两个机构,即社会福利研究中心和发展研究中心,则分别建立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内,受政府和大学双重领导。三个研究机构均有顾问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他们有权决定研究课题、经费预算和人员的聘用。这里顺便提一句,澳大利亚各大学高级讲师以上职位的招聘,要在英联邦各国公开登报,应聘者除提交自己的学位、职业经历等情况外,还要有三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推荐,然后由大学的评选委员会审查投票确定,“走后门”是不容易的。著名学者一般都愿意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推荐到外单位去任职,而不主张留用“接班人”,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近亲繁殖”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社会福利研究中心 建立于1980年,其任务是由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确定的。中心直接受大学副校长领导,研究人员大多由与大学有关系的教授和讲师兼任,专职研究者很少。该中心研究有关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理论与政策,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发表研究成果,提供和交流信息,并为攻读社会福利专业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和科研设施。目前研究的主要课题有:儿童与家庭福利,就业和失业问题,社会安全保障,住房问题,职业与报酬,

残疾人的社会服务等等。该中心在1986年8—11月组织了第二轮共四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主题分别是：①家庭与残疾儿童；②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③社会福利与少数民族问题；④税收、社会保障与生命周期。讨论会常有外国学者参加，英国、瑞典、加拿大等“福利国家”的学者参加讨论会的机会较多。

国立家庭研究所 是1975年根据家庭法而建立的。由家庭研究所参与修改的家庭法，已于1980年开始实施。该研究所所长是社会学家多·艾德加 (Don Edgar) 博士，现有十二名研究人员。研究所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的婚姻家庭研究工作，出版刊物和书籍，并且是全国的咨询中心和信息中心。该所还有权就家庭研究经费的预算和支出问题向总检查长提出建议，并发挥监督作用。目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有：①澳大利亚家庭及人口的变化对社会政策有何意义；②家庭法律及其他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及效果；③影响家庭职能的社会因素；④对家庭经济和福利状况的评估；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家庭政策实施效果；⑥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者与家庭。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带有明显的应用性质，它要向政府和人民提供关于家庭问题的实际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政策建议。它把研究、咨询和传播信息结合起来，从提供全国的家庭调查统计资料到指导编写中学的性教育教科书，以及指导社区的家庭服务工作，发挥多方面的职能，总的目的在于“保护作为社会的自然单位和基础群体的家庭”。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该研究所考察、进修或做研究工作。开展有关家庭演变趋势的国际性比较研究，是该研究所正在着手的一项任务。许多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该所的学者出席并发言。家庭研究所的图书馆对国内外一切人开放，计算机和数据库为全国各有关研究机构服务，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发展研究中心 设在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是1975年建立的。现在的执行主任是女经济学家海伦·休斯 (Helen Hughes)。该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专家，均有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休斯本人曾在世界银行的经济分析与规划局任职八年。这里除了吸收澳大利亚各地的学者及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和攻读学位外，还致力于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材。该中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但也不完全限于此范围。它的宗旨是要在有关发展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方面提供国际水平的训练课程，并密切配合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和澳大利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问题。建立为分析研究服务的资料库，向澳大利亚政府和有关的国际机构提供咨询。目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有：人口动态与人口政策，贸易、资本流动与工业化，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农业政策，援助政策，等等。

上述三个机构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系，以及墨尔本大学的亚洲研究院，都十分热心与中国同行建立学术交往。家庭研究所和发展研究中心均在1986年派了学者访华，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一次就从中国招收了十名硕士研究生。福利研究中心希望双方尽快交换学者和研究生，并就社会福利政策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学系的索尔·恩索教授已多次申请访华，目前还在排队等候机会。墨尔本大学的亚洲学院正在筹备建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拟把它建成一个多学科合作研究中国的全国性机构，并负责安排双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换学者。该学院的负责人西门华 (H.F. Simon) 教授早年曾在中国工作，1957年离华返澳。他精通中文，很有深谋远虑，他手下已有几位汉学家，还打算罗致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着力研究中国的开放、改革与社会发展，为进一步发展澳中双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辟新的渠道。

三、参观悉尼的“女难民之家”

到悉尼的第二天,就听悉尼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一位学者介绍了当地的社区服务情况。号称“福利国家”的澳大利亚,其社会保障项目如此繁多,真可谓“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主人在讲解时,发现我们对“女难民之家”(Women Refugee House)一词有些困惑不解,便答应安排我们去参观。

如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妇女在婚后生育子女期间一般是不工作的。近两年因该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即使无幼龄子女的母亲,找工作也困难。不得不依赖丈夫生活的中、下层妇女,在家庭中处境不妙,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时有发生。“女难民之家”就是为遭遇各种特殊困难而走投无路的妇女设立的救济组织,一般由州政府出钱聘用自愿服务者进行管理,负责向“女难民”提供住处和膳食,并为她们的幼龄子女安排教育和游戏,还设法给这些妇女找工作,使她们尽量自食其力。

据说“女难民之家”一般是不接受男士去参观的。为争取何建章同志进入,主人在电话联系时颇费一番口舌。

大学附近的一处“女难民之家”,与周围的居民住宅并无两样:绿树环绕的乳白色尖顶二层小楼,前面有带栅栏的庭院。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高个子中年妇女。她显然明白我们的来意,简单介绍了几句,便领我们径直后面的厨房去。几位妇女正在准备晚餐,她们边干活边同我们谈话,气氛倒显得不那么拘谨。

一位漂亮的女士看上去神情忧郁,但她似乎并不介意向外人吐露她的苦衷。原来,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婚后一直在家侍候公婆、丈夫,并照料子女。繁重的家务使她很快失去了少女的活泼与美貌,丈夫渐渐对她不感兴趣,婆婆也变得苛刻起来。后来丈夫另有新欢,就开始虐待她。她气恼、悔恨,一度轻生,被一位朋友发觉,打电话给社区服务组织,她就被接到难民之家来了。我们问及她目前的心情时,她肯定地说:“轻松多了。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到这里看到这么多姐妹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相互安慰,心情就不那么忧郁了。在这里大家劳动、生活得一样,感到平等、安全。”她说她很想念孩子,打算找个工作,租一处房子,然后接子女到身边,再也不受男人的气了。

另一位妇女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殴打,终于带着两个幼龄子女离家出走,逃到女难民之家来了。我们问她丈夫来看过她和孩子没有,她冷笑着回答:“来过,忏悔过,有什么用?他是改不了粗暴的本性了。我们现在不让男人到这里纠缠,更怕他们来夺走孩子。”据说,离婚的母亲若自愿抚养子女,法院是不判男方给抚养费的。因此,离婚的母亲处境格外艰难。这位妇女也表示很希望有工作,能使自己的孩子生活好些。但是,到了难民之家来的妇女,一般的文化教育水平都不高,若无特殊技能,是很难就业的。

管理这个女难民之家的海伦女士,也曾是一位女难民。她与丈夫不和而离家。在与一群不幸的女同胞相处的过程中,她爱上了社会服务工作。她是个基督教徒,把帮助别人解除痛苦看作是件光荣而高尚的事。尽管她的工作收入微薄,但她感到自己精神上很愉快。她告诉我们,每天都有一些不幸的妇女打电话来,但目前住处已不够了,政府允许租用旅馆,以解某些女难民的“燃眉之急”。

看来,悉尼的女难民队伍还有扩大的趋势。虽然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已够多了,但那并

不能挽救日渐增多的家庭悲剧。不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之苦，又享受不到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利，她们之中，不乏精神与心理病患者，自杀事件有增无已。妇女问题已成为澳大利亚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四、对澳大利亚社会的一般印象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温带地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地广人少、海岸线长，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有些不利条件，如沙漠面积大，内河少，淡水资源有限。但总的说来，现有的一千四百万居民享有的自然资源平均量是世界上少有的。

早期的英国移民，对澳大利亚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战后的欧美移民，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更多的资本、新技术、专门人才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使澳大利亚的工业化、都市化及文化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目前，澳大利亚的物质生活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甚至超过了欧洲某些国家。全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当高，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较好，社会服务很发达。欧洲人把种种种树的好习惯带到了澳洲大陆，这里的城市绿化、住宅美化，到处是花园，优雅洁净的生活环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外发型”现代化的特点也显而易见：它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是由几次移民流推动的，高级技术与人才靠从外边“引进”，它本身的经济主要靠出口原材料，即矿产资源和农畜产品，而大多数工业品要从国外进口。这就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经不起国际市场风浪的袭击。最近由于国际油价和农产品价格下跌，使澳大利亚的出口受到很大损伤，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澳元贬值，国家财政吃紧，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从社会文化方面看，虽然战后新移民数量很少，但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仍有较大影响，近年来部分亚洲移民又带来了更为传统的东方文化。这些因素对澳大利亚的社会道德伦理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传统的家庭纽带不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迅速崩溃，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尚存，友谊、爱情仍被绝大多数人珍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不那么明显。又因为社会福利较多，工作和生活中的竞争不激烈，国家官员和大学院系领导人也属铁饭碗职业，官僚主义现象较严重，如此等等。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看，称澳大利亚为“半发达国家”或“半发展中国家”都是符合实际的。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是，澳大利亚工党势力较强，它执政时期也较长。工党在争取社会平等和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及生活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此同时，过高的福利、过高的工资和频繁的罢工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影晌。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较明显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工会竭力反对外国移民到本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以保持现有的高工资。这种“保”的办法无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精神和增加社会的活力。显然，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其他自然条件并未被充分利用起来，许多地区和领域尚待开发。如果澳大利亚的经济全面地、立体地发展，劳动力紧缺将成为一大矛盾。目前，许多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开始谈论澳大利亚的“开放与改革”问题。税收与福利是当前的一大棘手课题，也是工党要继续执政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立立